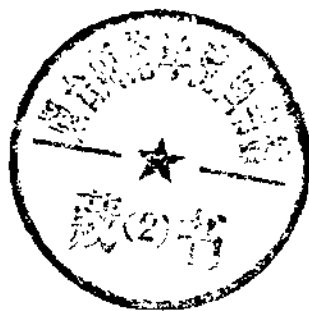


56475

山西文史资料

第三十五辑

(一九八四年第五辑)



K2506
221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王秀明

刘存善 赵文朴



目 录

· 政治 ·

林枫同志在晋绥·····	樊润德 (1)
牺牲救国同盟会平遥分会的日日夜夜·····	李文炯 (13)
我在牺盟总部政治交通局·····	邱文选 (25)
忆保德县战动委会·····	王金贵 (31)
记战动总会妇女工作团·····	刘冰梅 (39)
决死四纵队的宣传工作·····	李长路 (42)
大革命时期屯留县的革命活动·····	吴之冈 (46)
大革命时期屯留县的一个农民协会·····	吴之冈 (52)

· 军事 ·

决死二纵队的三个时期·····	刘耀夫 (56)
决死六团陈雄卿叛变纪实·····	任景龙 (73)
记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	贺寿祺 (78)
汾东游击支队的成长和发展·····	宋文英 (96)
抗战初期安邑县的武装斗争·····	贾献珞 (114)

· 人物 ·

贺龙与军马·····	马 云 (120)
贺龙同志二三事·····	陈正斌 (124)

和关向应在一起的日子里·····	王明亭 (126)
傅作义将军重视军队的经理工作·····	潘瑞征 (130)
记傅作义将军的几件事·····	王 兴 (133)
傅作义将军与阎锡山的关系·····	王 兴 (137)
我所知道的阎锡山·····	赵继昌 (141)

· 文教 ·

黄河出版社——牺盟会和新军的宣传机关·····	邵挺军 (159)
筱吉仙及筱门弟子·····	石文鉴 刘巨才 (172)

· 其它 ·

救护美国飞行员道格拉斯的经过·····	刘力民 (186)
---------------------	-----------

· 质疑 · 订正 · 补充 ·

对《阎日伪勾结接收太原亲历记》的订正·····	韩春生 (30)
对《晋中战役的若干史料》的订正·····	刘生、丰佩瑶 (41)
对《优秀的青年指挥员——王瑞烈士》的订正·····	黎 颢 (45)
对《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订正·····	李 敏 (55)
对《毛主席由延安到西柏坡途经山西日程表》的订正·····	章 彬 (72)
对《黄河两岸的地下斗争》的订正·····	郭聚义 (95)

林枫同志在晋绥

樊 润 德

林枫同志于一九〇六年出生在黑龙江省望奎县一个农民家庭。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抗日战争时期，正是他精力充沛的大好年华，他曾担任过中共山西省工委副书记，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晋西区党委书记和晋绥分局代理书记，直至日本投降以后，方才离开山西转到东北。林枫同志是晋绥根据地缔造者之一，他忠实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政策，为晋绥人民谋利益，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统一战线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枫在山西省工委工作的时候，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面研究在山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一面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党的组织和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活动上。山西工委通过牺盟会这一合法组织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在山西打开了新局面。

林枫进入山西兴县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事变的时候。当时面对阎锡山的反共高潮，林枫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沉着应战，率部北上，从晋西南转入晋西北。一九四〇年初，林枫参加了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滕代远主持召开的高干会议。会议决定晋西南区党委和晋西北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由林枫担任区党委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担任副书记。这时，由贺

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返回晋西北。山西抗日新军决死二纵队、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开赴边山地区同蒲线一带，同八路军并肩作战，保卫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晋西事变以后，一九四〇年二月初，由党中央派代表到秋林和阎锡山谈判，最后达成协议：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南面为阎占区，北面为解放区。至此，晋西北人民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在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等同志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在林枫的提议和主持下，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即抗日民主政权，组建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并建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统一了对全区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的领导，开展了独立自主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晋西北地区是个地广人稀、土地瘠薄、粮食产量很低的贫困山区，抗日军队的供应非常困难。特别是根据地初建的时候，由于这里搞不到别的粮食，党政军机关上自领导干部，下到一般战士，有时候一日三餐，都是吃煮黑豆。后来，连黑豆有时也得定量供应。林枫对此情况，焦虑万分。他召集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多次商讨筹粮筹款的问题。最后决定在晋西北开展“四大动员”工作，号召群众捐粮、献款、参军、做军鞋，积极支援八路军和驻扎在晋西北的新军，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和建设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当时在一般群众中已无粮可筹，只有一部分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的仓库里还有些余粮。林枫决定做地主、富农的工作。他亲自召开士绅代表会，反复给大家讲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地方士绅为国分忧，为抗日出力，并大力表彰了对支援抗日战争有功的刘少白、牛友兰、杨邦汉、孙良臣、刘墨林、武润生、张荫轩等一大批进步人士，号召所有士绅向他们学习。通过林枫耐心细致的工作，促使一大批开明地主和富农积极捐粮献款。兴县

蔡家崖开明地主牛友兰，把自己在兴县城经营的“福庆永”商店所有布匹全部拿出来，装备了八路军的一个整团。杨家坡开明地主杨邦汉一次拿出七百石粮食。临县大商人李余香，把自己开设的“恒信昌”资产全部捐献给抗日政府。他还和另一个进步工商业者冯锡藩给抗日部队解决了大批棉布。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林枫和贺龙建议，经过区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刘少白为晋西北农民银行总经理，任命孙良臣为高等法院院长，牛友兰、李余香、冯锡藩、裴明轩等人分别担任各县贸易局副局长或顾问，领导晋西北的工商业工作。在这一批开明士绅的带头影响下，晋西北的“四大动员”工作搞得卓有成效。根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四〇年，全区就捐献出黄金一百六十斤，白洋一百八十多万元，动员出各种粮食十四万石（一石为老秤二百六十斤），扩军一万五千名，做军鞋十二万双，解决了晋绥根据地创建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困难。

开展减租和大生产运动，彻底战胜困难

要从根本上解决根据地的困难，必须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精耕细作，多产粮食。为此，林枫提出，首先必须解决土地的租佃关系，从封建剥削制度的枷锁下把农民解放出来。当时，晋西北的封建剥削相当严重，农民一般没有土地和很少占有土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牺盟会和动委会的领导下，晋西北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根据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上规定的“二五减租”政策，做了不少工作，但远不彻底，农民没有得到更多的实惠。晋西北新政权建立以后，林枫提出，要继续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他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各地，调查研究，用典型开路，指导全盘工作。根据对临县甘泉村、河曲县五花城、宁武县宁化堡等二十多个村庄的调查，占农村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和很少占有土地，许多农民在重租和高利贷的盘剥下，终年少吃

无穿，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九四〇年春天，由林枫亲自主持，在兴县召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减租保佃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晋西北各县九十多个自然村的一百五十多名贫雇农代表。林枫在会上作了减租减息的动员报告，又通过典型引路，个别动员，提高了广大贫雇农的阶级觉悟。会议制定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条例，缓和了租佃关系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又规定了奖励群众开荒、兴修水利、种植棉花、繁殖牲畜和奖励劳动英雄、奖励发明创造等项政策。从一九四二年开始，每年都召开一次“群英大会”，大力表彰在对敌斗争和发展生产方面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这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晋西北的工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九四一年，据二十五个县不完全的统计，开荒面积达到二十万五千亩，增加产量四千九百七十万斤。据十四个县的统计，增加水浇地七万二千亩，超过了战前这些地区所有水浇地面积的总和。一九四一年，全区种植棉花三万二千亩，到一九四三年增加到七万一千亩。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为巩固和建设根据地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依靠群众，建设人民民主政权

晋西北区党委建立以后，一开始就注意抓政权建设，明确规定村政权的民意机关（公民大会或代表大会）与执行机关（村公所）为统一体，村主席和村代表都要经过民主选举，废除了阎锡山统治时期的闾邻制。但由于政权初建，未来得及整顿提高，加之日军轮番“扫荡”，使这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一九四三年三月，林枫再一次提出，要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民主建政运动，把民主建政列入党委的主要议事日程，号召人民群众昂首阔步地走上政治舞台，管理国家大事，认真选择自己的公仆。规定，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除汉奸、精神病患者、被剥夺公民权利者外，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级、党派、职业，都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由于宣传发动工作搞得好，广大群众积极参加选举，就连一些一向不问政事的老人、病人、聋哑人、盲人都投入了选举活动。

在选举中，林枫坚决贯彻“三三制”的政策，规定共产党员在政权机构中只占三分之一，把三分之二的名额，留给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外群众。一九四一年十月，林枫在晋西北行署第三次行政会议上，代表晋西区党委向大会提出了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提案，要求全区人民在广泛的选举基础上，积极筹备“临参会”，让各方面的代表参政。经行署政务会议决定，组成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备会，由国民党元老、新军领袖续范亭等十五人组成筹委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黄河西岸的呼家庄召开了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出席大会的一百四十五名代表，共产党员占四十七人，不及三分之一。林枫当场宣布了共产党员的名单。这种坦白诚恳、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到会的代表深受感动。右玉县参议员、国民党党员王绪先生说：“过去，我曾对共产党所说的与非党人士合作有过怀疑，今天完全消失了。”

参加这次临时参议会的许多参议员，看到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改善和浓厚的民主气氛，非常感动。大会开幕典礼时，参议员赵费庵登台演说：“我是来自敌占区的，亲眼看到了日军的烧杀抢掠，感到无限的悲愤；今日见到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内心悲喜交加，不禁泪洒胸前！”

正当临时参议会召开的时候，日军对晋西北发动了一次大“扫荡”，企图破坏大会的召开。各地参议员，冲破敌人的封锁和“扫荡”，冒着生命危险赶来参加会议。朔县参议员、洪帮领袖蔡厚老先生，当时已经是七十高龄的老人了，还日夜跋涉，徒步七百里，冲出平鲁、朔县敌人的包围，赶到了会场。崞县六十一岁的女参议员张兰女，虽步履艰难，也骑着毛驴走了七、八天，赶来赴会。阳曲县参议员起程的时候，正遇上敌人出发“扫荡”，

他们夜宿荒郊，避开敌人的封锁和包围，赶到会场。临县参议员杨廉甫老先生，住在敌人的据点附近，接到开会通知后，带病坐担架赶来出席会议，因为劳累过度，病逝于呼家庄。这些生动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信任。至今，人们谈起当时晋绥根据地的民主空气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活跃，仍感叹不已。认为这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临时参议会经过十八天的讨论，最后通过了《巩固和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等文件。大会并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选举林枫为临时参议会的议长，刘少白、牛荫冠为副议长，阎秀峰、程进、杨廉甫、郭炳麟、刘墨林、陈顾三等六人为临时参议会常驻参议员；大会还选举续范亭为行署主任，武新宇为行署副主任，贺龙、刘佑脚、张文昂等十九人为行政委员。

组织武工队，把敌人挤出去

一九四二年春季，日军采取了所谓“铁壁合围”、“瓮形队形”等战术，对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突然袭击。八路军、新军和游击队、民兵互相配合，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同敌人进行了大小二百多次战斗，终于粉碎了日军的残酷“扫荡”。五月，敌人又进行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被我军包围在兴县田家会一带，给予歼灭性的打击。日军不死心，又采用“蚕食”政策，步步紧逼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林枫亲自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党中央决定成立晋绥分局，以加强对晋绥根据地的领导。并决定由关向应担任晋绥分局书记，在关向应养病期间，由林枫任代理书记。

一九四二年八月，林枫在晋绥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时说：这下可有办法了，我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晋绥根据地的情况，毛主席很满意，他要我们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组织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与会同志反复讨论这

个问题：毛主席为什么不提把敌人打出去，或者赶出去，而偏偏要提把敌人挤出去？认为这个“挤”字大有文章。林枫综合大家的意见，指出：毛主席之所以提把敌人挤出去，主要是根据敌我力量的具体情况而说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敌军全力发动对晋西北根据地的大“扫荡”，后来又采用了“蚕食”政策，反复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根据地大为缩小，原来有三百万人口的根据地现在被压缩得不到一百万人口，而且把我们围困到紧靠黄河边的一块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敌人赶出去，或者打出去，都是不现实的，只有一步一步把敌人挤出去。林枫客观地分析了晋西北的情况，要求各地组织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武装地方民兵，充分发挥敌占区地下党组织的作用，利用一切有利战机，打击敌人。

在挤走敌人的方针指导下，晋绥根据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敌占区附近组织起四十多个武装工作队。为了提高武工队的战略战术，林枫提出举办武工队训练班，分期分批培训武工队员。挑选武工队员的基本条件是：思想政治觉悟高，党性强，有胆有识，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一定的作战经验。训练的主要内容是：结合学习整风文件，深刻理解毛主席提出的“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总结各地对敌斗争的经验，逐步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在挤走敌人的斗争中，武工队发挥了短小精干的战斗优势，能打则打，能扰则扰，分进合击，挤得敌人心惊胆颤。林枫总结武装工作队挤走敌人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敌占区的日伪军开展政治攻势，利用各种机会向敌占区人民宣传党的政策，摧毁敌伪政权，建立情报网。发动群众不给敌人送水、送粮、送柴炭。如果实在拖不过去，就和群众商量好，让群众佯装送粮、送草，武工队夹在群众中，利用战机伏击敌人，并掩护群众撤退。有些地方，把敌人建立起来的伪政权夺

取过来，改造成为两面派政权，即名义上是日本人的维持会，实际上干抗日的工作。对于维持会中的某些人，则采取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教育他们转变立场，为抗日立功赎罪，除过那些罪大恶极、死心塌地为敌人办事情的大汉奸必须处置以外，一般地都给出路，以达到最大限度孤立敌人的目的。

第二，发动群众，采取各种办法，骚扰敌人，打击敌人，使它无法“蚕食”，无法生存。比如八分区的武工队，发动群众断绝了敌人的水源。忻县蒲阁寨是敌人占领的一个大据点，自从我们提出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后，附近的老百姓都想办法搬离了敌占区。敌人抓不到老百姓，吃不上粮食，喝不上水。并且一露头就碰上武工队的子弹，所以只好夹着尾巴逃走了。

第三，创造了以地雷战为主的战略战术，炸得敌人寸步难行。一九四三年，交城县武工队员韩凤珠，创造出“踏火手榴弹”，并发明了“地雷带枪”，在围困朱化敌据点时，大显神威，炸得敌人放弃据点而逃。其它地方创造了磁雷、石雷、铁雷、玻璃瓶子雷、瓷壶雷，甚至把吃饭用的锅、碗、盆、勺都变成了致敌于死地的武器。

在挤走敌人的战斗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一九四四年召开的晋绥边区第三届群英会上，林枫充分肯定并推广了张初元、段兴玉、温象栓、李有年等人埋地雷挤走敌人的劳武结合的经验，从而把对敌斗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九四三年，武工队在配合晋绥军民挤掉敌人五十八个据点，推广了张初元劳武结合的经验以后，又挤掉敌人的七十多个据点，收复了二千六百八十五个村庄，解放了三十六万人口。逼得敌人走投无路，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

注重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

林枫同志不仅注重抓对敌斗争，而且很重视抓干部队伍的思想

想建设。他常说，培养教育干部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不仅现在需要培养大批干部，带领群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到抗战胜利以后，更需要有一大批干部去建设社会主义。林枫刚到晋西北，就把原来的党员训练班改为党校，亲自担任党校校长。一九四二年，根据地逐渐缩小，游击区和敌占区的许多干部无法隐蔽，林枫决定在内地举办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轮训党政军各级干部。

林枫虚心好学，经常手不释卷。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发出整风号召，林枫在晋绥分局机关建立了学委会，组织了学习巡视团，出版了《晋绥学讯》，指导全区各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并且出版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代会议上的讲话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书，这是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一个版本。一九四三年底，晋绥边区翻印出版了大批毛泽东著作，并把《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精装出版，发给党内外干部阅读。

林枫也很注意抓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建设。他说“小学教育是基础”。晋西北的文化一向落后，农村中的文盲占绝大多数。抗战以前，晋西北仅有的一些学校，大部分毁灭于战火。林枫到了晋西北，立即着手抓国民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一九四三年春季，在林枫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学与战争、生产、社会、家庭相结合的方针。一九四四年，全边区小学发展到九百六十九所，在校学生达到七万八千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同时，还办民校，办冬学，办农民识字班。不论民办或者公办的学校，一律不收学费，一般小学课本都是由公家发给，有些学生因家贫不能入学，政府就全部免费。年龄大的儿童，需要帮助家庭劳动，就采取半日制或上夜校的办法。有些放牛娃，把书本带到山间田野，一面劳动，一面识字。在管理学生的方法上，废除了打骂学生的制度，推广了民主教学和

说服教育的方法。接着林枫又主持筹建了两所中学和一所相当于大学的抗战学院。后来因为财政困难和“精兵简政”，把抗战学院改为晋西师范。同时，新办了临县一中、保德二中、贺昌中学和永田中学。这些学校都以培训干部和轮训师资为主。对毕业以后要求继续深造的青年，分期分批地送到延安“抗大”。一九四四年底，全区普遍办起了小学，较大的村庄和集镇办起了中学。

林枫还很注意抓报纸、广播等宣传工作。一九四〇年，晋西区党委刚组建，林枫就领导筹办了一份铅印报纸，即《抗战日报》，后改名为《晋绥日报》。稍后，又办了一份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晋绥大众报》。此外还办了不少杂志。由于环境艰苦，不少新闻工作者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林枫同志深表痛惜，亲自布置、主持追悼会，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哀思。

林枫还注意抓文艺宣传活动。在他的支持下，晋西南区党委的文艺宣传队，被扩建为七月剧社，晋西事变以后，随军北上，经过扩充改组，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较高的艺术水平，深受群众欢迎。不久，林枫又领导组建了晋绥人民服务团、晋绥文联文工团和吕梁、雁门、大众服务剧社。连同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全边区文艺单位发展到二十多个。

边区文艺创作搞得也很活跃。一九四四年，在林枫的倡导下，晋绥边区文联举办了一次《七七七》文艺有奖征文，收到应征剧本、散文、诗歌、曲艺、图画一百三十多件。其中比较好的作品有《大家好》、《王德锁减租》、《张初元的故事》等，都是作者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产物。其后的《闹对了》、《吕梁英雄传》等作品，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较高的艺术水平。

荣获“实干家”的美称

林枫同志工作踏实，注重调查研究，有事同群众商量，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来不说空话、大话，特别是反对说假话。任弼时同志曾经赞扬林枫是我党的一位实干家。

林枫胜不骄、败不馁，工作顺利的时候更加谦虚谨慎，工作出现偏差的时候，总是认真分析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九四〇年，开展“四大动员”工作时，因为在运动中遇到阻力，特别是有些顽固分子，故意把粮食装在大缸里，埋藏在地下，不给军人吃。当时的基层干部缺乏工作经验，采取了一些强迫命令的作法，有的地方搞捆绑吊打、开斗争会。林枫发现以后，及时作了纠正，并主动承担责任。他反复教育干部，既要完成任务，又要注意工作方法。经过林枫的耐心开导，基层干部很快改变了工作作风，使运动走上了正轨。

一九四二年，晋绥边区开展了整风运动，后来发展成“抢救”运动。因为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运动搞得扩大化了，伤害了一些干部的积极性。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林枫很快作了纠正。他教育大家要设身处地想问题。在晋绥边区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他主动检讨错误，承担责任，要求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有多少特务反多少特务，不能搞扩大化。对于错整错斗了的人，要赔情道歉，认真甄别，彻底平反。

林枫为人忠厚寡言，宽宏大量，遇事能高瞻远瞩，识大体，顾大局，从来不无原则地处分人，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不和别人闹成见；遇有分歧，总是以向前看的态度，主动设法消除意见，不为个人利益违反党的原则。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宽容。他常说，一个领导干部，要有海量。林枫所说的“海量”就是指一个共产党员所应该具有的政治修养。他说：“一个革命者，理应有高度的政治修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从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个人谋取私利，更不能做随感而发的自由主义者。”

林枫对于犯错误和有缺点的人总是耐心帮助，反复开导，鼓励他们认识缺点，改正错误。他常讲，批评人要注意时间、地点、方法，要实事求是地考虑对方可能接受的程度，否则，就难

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经过他帮助或者受过他批评的人，都感到他诚恳可亲，使人心悦诚服。在和同志谈工作时，他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讲话，耐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并善于把不正确的意见引到正确的方面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林枫初到晋西北，将原八地委书记饶斌调来担任晋西党校副校长，将原三地委书记宋英调来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长。饶斌是上海医大学生，宋英是北大地质系学生，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让他们担任晋西北根据地党的高级领导工作，本来无可非议，但是有人却说林枫重用知识分子。林枫听到以后，向他们作了耐心的解释，终于使大家统一了思想，团结起来建设根据地。

林枫组织观念很强，对领导分配给他的工作和任务，从来不讲价钱，不讲条件，不怕困难，总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不管是在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时候，还是在大生产运动蓬勃兴起之际，林枫总是尽可能以物资支援陕甘宁边区，支援党中央机关，并教育晋绥人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他严格要求，不许生活上有任何特殊。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普遍认为他具有较高的领导艺术，善于随时掌握不断变化的情况，因势利导，及时提出完成任务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和措施，并能够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林枫曾经给刘少奇担任过秘书，少奇同志称赞他“很会办事情”。晋绥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和他接触较多，认为林枫在晋绥工作期间，充分表现了突出的组织才能和知人善任、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尚品德。

林枫同志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进军东北，离开了晋绥。

作者附注：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访问过张稼夫、秦穆伯、郭明秋、牛荫冠等同志，并参阅了晋绥边区有关历史资料。

（本文作者现任兴县党史研究室主任）

牺牲救国同盟会平遥分会的日日夜夜

李文炯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我在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学习了很短一段时间后，便和李庆和一道，被分配到平遥县，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平遥县分会特派员。为了使我能充分了解平遥县的斗争形势，雷任民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他告诉我，平遥反动封建势力比较大，特别是教育界中，青洪帮组织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到那里去开展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他还向我解释说，派我到那里去，是他向党组织提出的建议，嘱咐我要充分认识斗争的复杂性，放手大胆地开展工作，很快打开局面。

在我临去平遥之前，牺盟总会负责人对派往各地的人员举行了一次例行的接见。接见我们的总会负责人有薄一波同志和梁化之。他们都讲了话。梁化之的讲话主要是为阎锡山吹嘘，并号召用“牺牲救国的决心，保卫山西”。薄一波同志在讲话中，勉励我们肩负起发动民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重任，尽快赶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他还当着大家和梁化之的面，指名对我说：“你不是不久前才从监狱出来吗？现在我们是统一战线，过去的已经过去。但现在还有人认为你是共产党员。到平遥后，要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救国。”薄一波同志的这番话，不但是有意说给梁化之听的，也有力地暗示我们，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有力武器，放手大胆地开展工作。